

开卷丛书

翹楚之吟

先秦两汉诗歌卷

刘冀鲁 晋 编著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11
育出版社

开卷丛书

翹楚之吟

先秦两汉诗歌卷

刘冀鲁晋 编著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陕) 新登字 004 号

· 开卷丛书 ·

翺楚之吟

——先秦两汉诗歌卷

刘冀 鲁晋 编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7 印张 4 插页 163 千字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11,000

ISBN 7-5419-6568-5/I·304

定 价: 10.30 元

面对绵延的高山巨灵

杨匡汉 汤学智

人生需要两种空间——物质的空间和精神的空间。作为文明之花的文学，为人类生存提供着广阔的精神空间。

人的生命如逝水，一去而不复返。惟文学与艺术，往往可以追回人们曾经有过的生命体验，或进入另一种足资向往的可能的人生。正因为如此，当你工余饭后，案前林下，一卷在手，古往今来，神游物外，可增长知识，陶冶性情，滋润生命，抚慰心灵。阅读好的文学作品，有如良师耳提面命，有如友朋品茗夜话，有如情侣倾诉衷肠，亦有如听风听雨过清明……故古人有“开卷有益，不以为劳”之说。作为一个现代文明人，企望视野的开放和精神的拓展，那就应该对文学，尤其是本民族文学，有深入的了解和体认，从而进至文明度更高的精神生活之中。

当你开卷时，你所面对的文学世界，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和浩瀚的。

从本质论角度看，文学是人学，也是心学。它是人的生命的律动，心灵的歌唱，是人的情感和智慧孕化的产物，是人的具有无限创造潜能的本质的自由显现。文学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内在精神。在社会生活中，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文学；有什么样的人群，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而且，只要人类还将继续生存发展下去，文学之花也一定会愈开愈鲜艳。在文学内涵中，最深

刻的便是它所体现的人的内在精神的普遍性底蕴；同时，由于任何人群、任何民族都是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生成、发展和演化的，并由此铸造出与众不同的特殊的民族个性，故而文学又自然地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殊的民族风貌和文学精神。

从本体论角度看，文学是承载生命信息的语言建构。在长期的文学积淀中，形成了由各种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文本构成的文体系统。以文体类型而论，文学由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基本类型构成；以审美需求而论，有俗文学与雅文学之别；以创作流程而论，又有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分。所谓民间文学，是指大多由人民大众集体创作，反映民众生活愿望，并用口头演说形式，在人民大众中间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学。所谓通俗文学，是指用通俗的书面语言形式表现大众所喜爱的生活内容的文学作品，大都流传于都市市民中间，也可称为市民文学。所谓雅文学，是指由具有丰富文化修养的作家创作，用比较高雅的艺术语言形式，表现某种比较深沉的人生体验和复杂的社会思想内容的文学作品。层次与功能不同的各种文学共生互补，相辅相成，构成了文学的百花园。每一种具体文学样式，每一部文学作品，也都有自己的灵魂与血肉。正是这些众多的“生命”，建构起文学的生命系统。

从发展论角度看，在历时方向上，文学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共时形态上，它又包含了全世界不同民族地区，不同发展程度的文学。同时，它还是一种正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活的文学，人类正在不断地把自己从现实发展中展示出来的新质注入其里。因此，我们看待文学，必须站在本民族以至全人类共同创造所积成的巨大精神财富上，既不能割断古今，也不可划地为牢，应对文学的传统予以充分的尊重，对文学的创新持宽容的器度。

《开卷》作为普及性的大型文学丛书，旨在重点介绍和阐释中华民族文学、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为有助于读者阅读，有必要对中国文学的常识，作一些说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已有 5000 年的文明史。中国文学同中华民族一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历史发展中，汉民族文学始终居于主导的和中心的地位。早在文字发明以前，汉民族的文学就以神话和传说的形式，在人民口头诞生并流传了。像“女娲神话”、“羿神话”、“大禹传说”等等。这些独具特色、有永久魅力的上古神话传说，足以同世界上最优秀的神话传说媲美。

中国文学的发展，一般按照历史分期，划分为四个阶段：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

古代文学，上起先秦时期的西周，下至 19 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前后 3000 余年。

诗歌是产生最早、发展最充分、成就也最为辉煌的一种艺术形式。中国有“诗歌大国”之称，古代诗歌以《诗经》和《楚辞》为源头。前者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后者以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为代表，气势磅礴，想象奇特。古代诗歌发展到唐宋时期，进入黄金时代，诗人辈出，诗篇累累，形成了以律诗为标志的近体诗。宋元之间，同诗有着密切联系的两种文体“词”和“散曲”，得到长足的发展，甚至分别成为宋、元时代文学的重要标志，故有“宋词”、“元曲”之说。词和曲是诗与音乐结合的产物。它们比律诗更为自由、灵活，利于传情达意。

古代文学中产生较早的还有散文。散文的源头可推先秦时期的《周易》、《尚书》、《春秋》、《左传》以及《庄子》等诸子散文。古代散文的发展有三个重要阶段。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百家争鸣中的诸子散文；二是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涌现了“唐宋八大家”；三是明清时期，诸如“竟陵”、“桐城”等流派的散文，

均异彩纷呈。

古代小说出现和发展较晚，这同它长期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邪宗”有关。小说虽萌芽于汉魏六朝，唐（传奇）宋（话本）时期均有长足进步，但比较繁荣发展的局面直到明清两代才出现。这是那时城市经济发展的结果。明代主要是“拟话本”和通俗体长篇章回小说，如《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我国第一部以描写日常家庭生活为中心的小说《金瓶梅》。以及短篇小说集“玉言”、“二拍”等。这些作品的出现，标志着小说已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转向描写现实社会的寻常生活，从而进入一个新的艺术领域。清代的《红楼梦》便在这一艺术方向上，达到了古典小说的高峰。此外像《儒林外史》等等也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平。这一时期的《聊斋志异》，虽同“志怪”、“传奇”一脉，但在对社会黑暗的揭露中，包含着对自由幸福和光明的追求，成为文言小说的翘楚。

古代戏曲的开端是元人杂剧。杂剧包括“唱”、“念”、“做”等多种戏剧样式，可谓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综合体。它最初以北京（大都）为中心，流行于北方，很快传遍全国。元、明、清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剧作家和作品。如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从此，中华古国从政治到经济、文化，开始了急剧、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第一个阶段，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史称近代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也称为近代文学。

这一时期，政治上、军事上失败的现实，和西方文化的传入，使得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对自己国体的腐朽、文化的落后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在文学上有着明显的反映，最突出的是资产阶

级改良主义代表人物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提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在这种主张影响下，出现了《官场现形记》（李宝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沃尧）、《老残游记》（刘鹗）和《孽海花》（曾朴）等一批以揭露当时社会黑暗为主的“谴责小说”。同时还出现了许多进步的爱国的作家、诗人。自此以后，就其主流来看，文学与国家政治、民族命运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中国社会和文学进入“现代”时期的标志，是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自“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国的国情十分复杂多变，这给文学以直接的影响。“五四”前后，以反对封建蒙昧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主要旗帜。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工农大众和知识分子随着自身的日益觉醒，要求文学更自觉地表现自己的斗争生活，并且在形式和语言上进一步要求通俗化、大众化。30年代后期开始了抗战文学时期，其中包括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文学，以东北三省为中心的沦陷区文学，上海的“孤岛”文学，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抗争文学。现代文学时期尽管只有短短30年，但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不仅使它彻底完成了文学采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科学民主思想的内容上的深刻转变，而且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积极的革新和发展，开拓了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诗、报告文学等新的文学体裁，从而使中国文学开始同世界文坛声息相通。这一时期，出现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艾蕻、曹禺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作家。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文学，称为“当代文学”。当代文学40余年，在大陆，可以“文化大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颂歌文学”为主潮。到文化大革命，整

个文艺园地一片凋零。粉碎“四人帮”之后，“文革”的惨痛事实，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回过头来对自己的民族和历史进行深入的反省，这就促成了“反思文学”的出现。到80年代，反思由社会角度进入人的层次，继而又深入到民族的文化心理层次，遂有“寻根文学”之问世。这一时期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些青年作家现代主义和新写实主义倾向的探索。从历史眼光看，“文革”以后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突破性的开拓和创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发展态势，是新中国文学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还包括同一时期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文学。台港文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学的一部分，在与大陆相异的特殊的人文环境中生长发展，有其明显的殊相，但同根同宗同文，其人文精神和语言风貌，却与中国文学传统命脉相通。台港地区有不少优秀的作家和作品，理应纳入“开卷”者们的视野。

中国文学又具有多民族性。除汉族外，尚有55个兄弟民族。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情况比较复杂。有些民族，如藏、蒙、维吾尔、哈萨克、纳西、彝、满、柯尔克孜等族，都有自己的文学，这些少数民族文学遗产，有不少优秀的民族作家。有些民族还出现了能以汉文写作的著名作家，如杂剧作家李直夫（满族），散曲作家贾云石（维吾尔族），杂剧作家杨讷（蒙古族），词人纳兰性德（满族），作家尹湛纳希（蒙古族）等。从总体上看，少数民族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其中影响较大的，除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世界著名的英雄史诗外，还有维吾尔族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傣族的《召树屯》、《娥并与桑洛》，彝族的《阿诗玛》，蒙古族的《嘎达梅林》，以及苗族、侗族的诗歌等。这些少数民族文学有如璀璨的明珠，与汉民族文学互相辉映，把中国文学的花苑装点得绚丽多姿。

中国文学历经了如此漫长的旅途。这片故园神州，是它丰腴的精神沃土，一代接一代地生长出文学之树、艺术之果。这世代相续、不断繁荣的文学艺术，恰似绵延的高峻山岳的巨灵，震撼着也温暖着人心与人生。我们为之自豪的还在于，中国各民族之间文化精神历来互相交流和影响，从而为文学的民族融合、艺术发展不断开辟着道路。中国文学中的民族精神始终是鲜明的、无可替代的。这也使中国多民族文学的人文精神有其极为丰富的包容性，体现出举世公认的博大深远的气象。

基于上述的认知，《开卷》丛书力图以科学的态度、历史的眼光、深入浅出的叙述，系统而又简要地向广大读者介绍中华民族文学的基本脉络和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之精萃，以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为达此目的，丛书诸卷取以“文”为主、“文”“史”结合的编著体例，既侧重精选作品和文本导读，同时对所涉及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品类的概貌、特征、价值等进行史的分析。全套丛书共24卷，其中包括外国散文、小说、戏剧各一卷，旨在为我们提供一种参照和借鉴。编著者均为在各自学术领域里耕耘多年的老、中、青专家学者。尽管如此，这套丛书仍然难以呈示伟大祖国无比丰富与恢宏的文学景观。但愿它作为广大读者的人生伴侣，携您共同步入辉煌的文学殿堂。

1993年夏 北京

前言

傅美琳

我国是诗歌之国，在灿烂的古代文化中，诗歌作为一种最早形成的文学体裁，闪耀着绚丽夺目的光辉。在中国诗歌几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先秦两汉时期作为它的源头和最初的发展阶段，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疑，唐诗，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巍峨的高峰。但是在它之前，我国诗歌史上也曾出现过几次艺术高峰，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雄厚坚实的基础。

(一)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诗歌的第一个艺术高峰，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诗经》收入自西周初至春秋中期大约 500 多年的诗歌 305 篇。它原名为《诗》或《诗三百》，汉代尊之为经，后代沿袭旧称，作为书名。它的编集成册大约在公元前 600 年左右，作品涉及到当时 15 个诸侯封地，约在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一带，诗的作者多已无法考知。

《诗经》包括风、雅、颂三部分，是编辑者根据收集诗歌的来源和它们的音乐曲调而作的一个大致分类。“风”，共 160 篇，有

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又称“15 国风”，是流传于 15 个地区中的、用富有地方色彩的乐调演唱的诗歌，内容大多反映民间的生活。“雅”分为小雅和大雅。“小雅”74 篇，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的诗。“大雅”31 篇，大部分是西周前期的诗。“雅”是秦地的乐调，大都是在朝廷上演唱的诗歌，内容包括政治讽刺诗、史诗、祭祀诗、宴会贺诗等，其中小雅多反映了人民生活 and 奴隶主下层生活。“颂”共 40 篇，主要是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写奴隶主贵族的生活。其中《周颂》31 篇，为西周初期作品，内容多是歌颂周代统治者和先公先王的德行；《鲁颂》4 篇，是春秋中叶鲁国贵族歌颂鲁僖公的诗；《商颂》5 篇，是商朝贵族及后裔祭祀先公先王的乐歌，从思想性、艺术性来看，风、雅两部分诗歌成就较高，构成了《诗经》的主体，《诗经》中一些最优秀的作品，基本上都在这两部分之中。颂诗中，只有几首可和风、雅诗媲美。

《诗经》是我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光辉起点，它从不同的角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蕴含着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其中有反映人民生活的如：《魏风·伐檀》、《豳风·七月》、《小雅·甫田》……。这些诗篇，构成了一幅人民疾苦生活的图画，展示了奴隶遭受压迫剥削的生活现实，表达了奴隶们的不满情绪和反抗精神，是《诗经》中思想性比较强的作品，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芒，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有反映爱情和婚姻生活的如：《卫风·氓》、《邶风·静女》、《召南·野有死麋》、《郑风·萼兮》、《郑风·狡童》、《陈风·泽陂》、《唐风·葛生》等，在《诗经》中占很大的篇幅。它们或写相恋之情，或写新婚之欢，或写被弃之苦，或写私奔之乐。情真意切，具有深刻的社会性。也有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如：《大雅·瞻仰》、《小雅·大乐》、

《秦风·黄鸟》、《唐风·鸛羽》、《卫风·伯兮》、《豳风·东山》、《邶风·新台》、《齐风·南山》等。这些诗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的真相，客观上揭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和制度的不合理。还有的记述了从后稷出世到武王灭商的许多传说和史迹，描写了奴隶主贵族祭祀和欢宴的情景，如：《周颂·清庙·丰年》、《大雅·生民·公刘·緜·皇矣·大明》、《小雅·楚茨·伐木》等。这些诗篇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都可当做史诗来读。综上所述，《诗经》所反映的生活面是丰富、广阔的，可以说是一部西周 500 年间的巨型历史画卷。

《诗经》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的贡献是巨大的，这种巨大不仅在于它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也在于它所具有的辉煌艺术成就。《诗经》的艺术手法，前人概括为赋、比、兴三种，与风、雅、颂合称为“六义”（《诗·大序》）。风、雅、颂是《诗经》的分类体系，而赋、比、兴是《诗经》的艺术手法，它的基本概念，据宋代朱熹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物也”。赋，就是陈述铺叙的意思；雅颂诗中多用这种方法。如小雅中的《采·薇》、《斯干》、《节南山》，大雅中的《生民》、《板》、《荡》，鲁颂中的《泮水》，商颂中的《长发》等。国风中虽较少使用，但也有以此见长的，如：豳风中的《七月》、《东山》，郑风中的《溱洧》等。这些诗篇描写事物，有的首尾周全，淋漓尽致；有的重点突出，反复涂绘；有的直而有曲，委婉多姿，把客观事物反映的明白清晰。比，就是比喻，“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比于事”（《文心雕龙·比兴》）。从而使形象更加鲜明生动。如：《邶风·相鼠》、《魏风·硕鼠》，都用老鼠来比喻奴隶主的可憎可鄙。《豳风·鸛鸛》托秦鸟之言，以鸛鸛比喻残暴者。《卫风·氓》中，以桑树由繁茂到凋落比喻夫妻爱情的变化。《邶风·终风》以既风且暴的恶劣天气

比喻丈夫的骄横暴虐和喜怒无常，非常具体而形象。兴，是起兴、发端的意思。大都是诗人触景而情生，先用一两句话描写一下周围的事物，以引出后面有关的诗意。如《周南·关雎》、《周南·桃夭》、《秦风·蒹葭》、《陈风·泽陂》、《召南·殷其雷》、《桧风·隰有苕楚》、《秦风·黄鸟》等。兴有的和正意有关，有的无关，有的有情调上的联系，有的只是从韵脚上引出下文。对于整首诗来讲它能起比喻衬托和写景叙事的作用，有助于塑造诗中主要人物的形象，加强作品的思想感情，同时它还能用摹声、状物的叠词来调节诗歌的韵律，使得朗诵起来音节铿锵，和谐悦耳，更富于抑扬顿挫的美感。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是诗歌的源流，它灌溉着中国诗歌的广阔园地，哺育着中国众多卓绝的诗人，对后世诗歌的发展和繁荣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

“楚辞”是中国战国时期出现的，以屈原作品为代表，具有楚语和楚音特征、富有地方特色和楚地民歌传统的一种新的诗体。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继《诗经》之后第二座艺术高峰，开创了浪漫主义的创作传统。由于其中的代表作主要是屈原创作的《离骚》，所以这种诗歌体裁又被称为“骚体”。两汉末年汉成帝时，刘向校编经书，把屈原、宋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诸人的诗作以及他自己写得《九叹》辑选成集，取名《楚辞》，这样《楚辞》又成了一部诗歌专集的名称，是《诗经》之后，对我国具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部诗歌总集。

楚辞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它的直接源头是西周末、春秋初期流行于江汉之间楚国领域的民歌，如：《诗

经》中《周南·汉广》、《召南·摽有梅》等篇。《说苑·至公》中的“子文歌”、《正谏》中的“楚人歌”、《善说》中的“越人歌”、《孟子·离娄》中的“沧浪歌”等。到了战国末期，楚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他在学习楚地民歌，吸取北方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楚辞这样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其特点有三：一是句子长短参差，形式比较自由。《诗经》的基本形式是四言体，而楚辞突破了四言格式，利用民歌的自然韵律，以五言为基础，字数不等，长短不拘，随着内容的需要交错运用，形式更趋于灵活多变，适宜吟诵。在语言上楚辞大量地使用了楚国的方言，如：“兮”、“些”、“羌”、“蹇”的运用，不但数量很多，还成为语言形式上的一个显著特征。特别是“兮”字，在句式中不仅能起到调节音节的作用，而且能疏通文章，形成了楚辞的语言特色。二是比兴手法的广泛运用。楚辞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并有进一步的发展。所运用的比兴形象与表现的思想内容合而为一，而不像《诗经》的比兴形象那样单纯和静止，也不再把用以起兴和比喻的事物看成独立存在的客体。因此，诗歌中的外物景象不再是自在的事物自身，而染上了一层浓烈的情感色彩。同时，楚辞还善于把各种对立事物表现在美和丑的不同形象中，比如用香花、美人喻君王、贤臣，用萧艾、鸱鸺喻小人、佞臣，使读者鲜明地区分善恶、良莠、美丑、贤愚，从而产生感情上的爱憎。三是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起于神话，这是朴素、自发的阶段。从楚辞开始，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得到比较自觉的运用。作者们无所拘束地发挥着丰富的想象和幻想，把神话传说、历史人物、自然现象编织成一个奇异的世界，在人与神之间架起了一座彼此沟通的桥梁，使作品充满了神奇瑰丽的色彩，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

在楚辞作家中，屈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是我国文学史

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一生处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他政治失意，身处逆境，颠沛流离，数次被贬，可他的爱国之心始终未变，爱美、爱善、爱真理的赤诚始终如一，至死不悔。他的光辉诗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反映了楚国社会的现实矛盾；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同时也清楚地表现了他“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以及“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媿。”（《惜往日》）的进步政治理想。表现他在“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社会环境中，修身洁行，独立不倚，坚持真理，永不妥协，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表达了他对祖国无比深厚的感情。屈原的作品除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外，艺术成就也极为辉煌，成为我国抒情诗的真正光辉起点。其作品与以现实主义为特色的《诗经》相比，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而且篇幅较工、句式较长，不用回环反复的复沓形式，它对后世的影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甚或在三百篇之上”。

楚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即“楚辞时代”。诗歌的创作主流，也由无主名、集体口头创作，进入了有主名的个人艺术创作。从此，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风”、“骚”并峙，成为两座不朽的丰碑。

（三）

汉承秦制，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政治的统一、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繁荣。这种繁荣除表现在辞赋和散文的创作上，诗歌创作也获得大面积丰收，成为继《诗经》、《楚辞》之后，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第三个艺术高峰。

两汉诗歌，可分为乐府民歌和文人诗两个部分，而代表汉代诗歌成就的则是乐府民歌。“乐府”是政府设立的音乐机构，除了

制订乐谱，训练乐工外，还负责收集各地民歌。“乐府诗”则是乐府机关配制音乐演唱的诗歌。汉代从武帝时开始设立乐府机关，采集全国各地歌谣配乐演唱。据《汉书·艺文志》所载篇目，仅西汉乐府民歌就有138篇，但并未全部流传，现存汉乐府民歌约50多首。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将自汉至唐的乐府分为12类，其中“相和歌辞”、“杂曲歌辞”、“鼓吹曲辞”三类中都包含着汉代民歌。在音乐上，这三类也各具特色，“相和歌”出自各地民间的新声，歌辞中称为“古辞”；“杂曲歌”是一种声调失传的杂牌曲子；“鼓吹曲”则是武帝时吸收的北方民族的新声，当时主要用于军乐。

汉乐府民歌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传统，具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不仅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而且具有高度的思想性，是两汉时期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特别由于它多是“街陌”之间的产物，更为深刻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有的写人民的贫困，如：《妇病行》、《东门行》、《艳歌行》、《平陵东》、《思悲翁》等；有的反映战争和兵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悲歌》、《饮马长城窟行》等；有的表现游子他乡的乡情旅情，如：《高田种小麦》、《巫山高》、《古歌》等；有的揭露上层社会奢侈荒淫的生活，如：《长安有狭邪行》、《鸡鸣》、《相莲行》、《陌上桑》等；有的叙述爱情婚姻的悲欢离合，如：《有所思》、《上邪》、《公无渡河》、《上山采靡芜》、《焦仲卿妻》、《白头吟》、《艳歌何尝行》。总之，通过汉乐府民歌，我们可以听到当时人民的声音，可以看到当时人民的生活情景，它是两汉社会全面而真实的反映。

汉乐府民歌不仅思想性强，在艺术性上也具有很高的成就。其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这一特色是由它的“缘事而